

●●● 战争·科学·人



日本 田中正俊



韩一德 译 隋宗茂 校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46
9



作者照

作者简介

田中正俊，1922年出生。

1943年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同年被日本陆军征召驱往菲律宾和台湾战场。1946年日本战败后恢复在东京大学的学生生活。1950年以《湖丝的发展》为题，提出了关于明清时代中国江南农村丝织业的论文，东京大学本科毕业，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1951年任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至今）。1954年任横滨市立大学讲师（1955年副教授），1967年任东京大学副教授（1973年教授），1983年任信州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1988年任神田外国语大学教授，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理事，图书部长（至今）。

主要著作：《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近代中国研究入门》（共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中国近现代史讲座》（共编、全7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中国现代史》（共著、山川出版社、1984年）等等。

固守真理者

——《战争·科学·人》序

刘大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出版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回忆录、研究著作等不知凡几。我个人稍有了解的，是其中两种思想观点互相对立的出版物。一种是篡改史事，颠倒是非，否认、掩饰那场战争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极力淡化军国主义。日本报刊上把这种出版物的思想观点叫做“皇国史观”或“文部省史观”，可谓鲜明扼要。那种史观反映出了人数少、能量大的旧势力的延续与蠢蠢而动。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注视。和这相反的一种思想观点的著作，是站在日本民族先进者的立场上，正视事实，不讳不隐，指出日本发动的是一场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类出版物地位突出，名著不少，一部分早有中译本流传。田中正俊教授的《战争·科学·人》是这类著作中最新的一

部。一个民族和个人一样，坦然面对现实，才能具备勇敢精神。在看待中日战争历史的问题上，非常明显，体现了日本这个伟大民族勇敢、进取精神的，不是前面那种观点，而是后面这种观点。

《战争·科学·人》思想丰富，论述醒豁。我想可以拈出这样几个字概括它的主旨：关怀民族，固守真理。著者一再强调，我们这些原本不应受到科学真理以外的任何东西所支配的人，如果屈从文部省那种“历史观”，身为历史教育家或研究者，首先就不能负起社会的责任。“无论在任何权力之前，吾人都应固守真理”。书上所有史事叙述，一概是这个主旨的贯彻。关怀民族命运，牢记社会责任，固守科学真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似乎是平常道理，并不新鲜。但是联系中国前一个时期学术理论界的实际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道理太平常了，以至令人心弦震撼。今年7月间，纽约《中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中国“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意识形态和它支持的国家政权对立了。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

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纽约《中报》1989年7月13日社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我以为《中报》社论道出了事情的实质。我们只须说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那种动态，从开始演变到后来严重混乱的局面，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髦理论”主要是诋毁、歪曲马克思主义，鼓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指责现实”则主要是指责中国社会主义，反过去一味地赞美西方资本主义。现在想来，当时不少就社会生活、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发表议论的人，如果不是忘掉社会责任，能够坚持科学态度，不管存在多少认识、观点对立，也肯定不至于闹到扮演起社会不安定促成者的角色。可惜事情并非那样。历史运动、重大事件的根据，最后在社会经济基础、人们的物质生活里面。历史从来不最后取决于意识形态、一些人的灵魂，然而历史又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定的意识形态、人的灵魂。由此可见，《战争·科学·人》所主张的关怀民族，牢记社会责任，固守科学真理这个“平常道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何是一个极不平常，唤人猛省的问题。不消说，科学真理绝非任何人所能够垄断。学术理论领域具体问题的分歧，不可能凭罢黜众家，定于一尊去解决，而必须依靠百家争鸣。在中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主张要坚持的真理，是指马

克思主义指导与社会主义道路。它们是基本的价值观念，就像确认中日战争中日本是侵略的一方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一样。

田中先生在《自序》里说，“谨以本书献给我们的老师刘大年先生”。对于田中先生的高情厚谊我深致感谢之忱。我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整个教学过程是由田中先生主持的。怎样看待抗日战争，那时大概因为不属于课堂的讲题，谁也没有提出专门讨论过。当然我更不知道面前这位历史学者，曾以一个21岁的青年被作为“学徒兵”驱赶上战场，历尽艰险。今天来读他这部把亲身经历和对那场战争客观冷静分析结合在一起的精到著作，新增加的了解何止限于文字所述。本书上讲的一个核心是“人”——发动战争的人，被迫参加战争或者死亡或者幸运活下来的人，利用科学技术从事活动的人，现在对战争的评价截然相反的人等等。人是社会动物，又不是机械简单的社会动物。书的情节告诉我们，这位历史研究家、教育家是一个主张自己民族也主张别的民族同样要自尊自信的人，是一位在为人师表上高自位置的人，一位敢于顶住强权，固守科学真理的人。

1989年8月

自 序

《战争·科学·人》这本书，最初是为1986年12月6日在日本国长野县松本市信州大学召开的，长野县科学家和平会议提出的论文，在此基础上，为纪念198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50周年，经补充修订而成。

原本定于1987年7月10、11日在东京三田庆应义塾大学召开的，芦沟桥事件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时完成，以呈献给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先生，但是修订稿当时未及完成，然而这时我却得到了先生的赠诗。

那是1979年的秋季，刘大年先生作为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来到日本，为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东洋史专业课程的学生，和在东京的我们这些后学，作了为期3个月题为“论辛亥革命的性质”的讲学和讨论。后来，先生在东京的那次讲义，以刘大年《赤门谈史录》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那之后，1985年先生再次来到日本，往日东京大学大学院听讲的各位为先生举行欢迎会，先生和各位在一起流

露着“宛如同窗会那样难忘的情怀”。遗憾的是，那天我因故未能参加，为此先生即席赋赠感怀诗一首。

酬东京大学研究院旧友并简

田中正俊教授（1985年）

南桃北李各争芳，又会赤门旧讲堂，
银杏迎宾清湿路，心池过雨碧盈塘，
范云结友尘埃少，刘向传经肺腑长，
独有田中名教授，西河执礼我难当。

刘大年 1987年7月 东京（注）

谨以本书献给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英勇战士，我们的老师刘大年先生；同时，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虽尽力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在本书中予以揭露，但由于认识和思想上的局限在所难免，尚请刘先生及各位予以指正。

最后，我还以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个成员，向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民族在侵略战争中作出牺牲的人们，表示深切的歉意。

1989年4月25日

于东京

注：座落于东京都文京区本乡东京大学的地址，是江户时代加贺藩（现在的石川县）的“大名”前田家的江户“上屋敷”的旧址。大学内的朱漆“赤门”和心字形池塘都是江户时代的建筑遗迹。而且“赤门”被称为东京大学的象征。

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
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的人悲伤，
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

日本战没学生手记〈听：海的声音〉

前 言

我出生于 1922 年。 1931 年 9 月，由日本关东军在满铁沿线柳条湖，阴谋挑起所谓“满洲事变”时，我刚刚 8 岁，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1937 年 7 月，在我 14 岁、中学三年级时，又爆发了芦沟桥事件，从而使“满洲事变”以来的中日战争，扩大到了整个中国。

其后，如所周知，随着战火的蔓延，日本政府为打开进退维谷的战争僵局，于 1941 年 12 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环。1943 年 12 月，我作为一名士兵，应陆军之召入伍，成为日本天皇（大元帅）统率的帝国军队的一员，直到日本战败的第二年，1946 年 3 月、23 岁时回国为止。因而，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大半，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度过的。

对于我在这场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早在 10 年前就曾经写过下面的话：

“为了保卫和平，向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谈谈

战争体验的这样一件事，最近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我于 1943 年 12 月，作为一名士兵应召到陆军。1944 年 9 月 16 日，自大阪出航开赴前线。那是装载有数万士兵的由 17 艘运输船组成的船队，行进中每夜都受到鱼雷的攻击，辗转来到马尼拉（Manila），在这里能够看到被誉为世界名胜的马尼拉湾落日的，只剩下这个船队中的 3 艘了。那是在台湾海、菲岛海空战时的事。之后 12 艘运输船的船队，又于 12 月 22 日离开已化为地狱的马尼拉，驶向新加坡。途中受到鱼雷更猛烈的攻击、炮舰的射击和来自飞机上的机枪扫射，在 1944 年除夕的一个黎明时分，船队仅存的 3 艘逃进了台湾高雄港，此时的我正颠波在其中的 1 艘之中。战败之后，1946 年初春，已是“少尉”的我从台湾回到和歌山县的田边港，从而结束了我的战争经历。

然而，直到现在，我对自己这前后 4 年的战争经历和感受，几乎不曾具体谈到过。这中间，我自己目睹的惨状，饱尝的痛苦和污辱，至今连我的家属仍然并不知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我感到自己个人的遭遇与最悲惨的战争现实，尤其与牺牲了的人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虽然感到谈这种个人的体验，在客观上也许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却不能轻易产生倾诉的心情。其次是，我在那场战争的经历

是那样地悲惨，以至于当谈起的时候，总担心这种追忆会不会被认为有所夸张。

不过最近我却认为，即使可以不谈自己个人的体验，但是“战争体验”是非谈不可的。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一种反动势力的进攻。^①

之所以产生这种对于战争感受非谈不可的心情，是由于意识到在以后的日本，谈战争体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当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想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良知来回顾自己在那场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① 《战争体验与历史的经验》《历史评论》第340号，1976年8月。

目 录

固守真理者——《战争·科学·人》序	刘大年1
自序	5
前言	8
一、战争体验与战场体验	1
(一) 后方和司令部的高级军人们	1
(二) 前线军人、士兵特别是牺牲 者的处境	3
(三) 战争中的一般平民	12
(四) 被侵略国家人民的遭遇	23
二、日本资本主义下的战争与武器	59
结束语——武器、科学、人——	72
附:	
《从“侵略”到“进出”》译者前言	75
从“侵略”到“进出”	76
译后记	83

一、战争体验与战场体验

首先我们应当弄清楚，通常讲到战争体验，尤其是把其中的战场体验抽出来单独谈论的时候，都认为战场体验是战争体验中最为残酷的部分。虽然到拿破仑时期的战争为止究竟如何不清楚，在后来的作为国家总体战的现代战争中，恐怕是很难区别出前线与后方的。

基于这一认识，我将战争体验问题分作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第一，后方的以至于司令部高级军人在战争中的情况；第二，前线的军人、士兵、特别是牺牲者在战争中的处境；第三，没参战的一般平民在战争中的境遇；第四，被侵略国家人民在战争中的遭遇等。

（一）后方和司令部的高级军人们

现代战争中的军队，是由多种部分组成的庞大的战争机构，因而对于在后方乃至司令部的机关中任职的军人，作为这个官僚事务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履行其日常公务的职责也就是他们的战争体验。

曾经以“补充兵”身分被征召入伍，在司令部里执

行过最下级士兵勤务的经济学家小林升氏对这种性质的战争体验，作过如下的回顾：

“所在的南方军总司令部，是在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中，除日本本土与中国之外广大地域的战斗中，立于若干兵团之上，行施间接指挥的官僚机构。它与很早以前的日俄战争时期，那种直接指挥第一线军团的总司令部不同，这里没有与部队共同食住的高级将校，部队虽然住在总司令部所在地高级中学里，但寺内（寿一，引者注）总司令官和其他参谋及将校们，却分别在西贡、提岸（Cho'-Lo'n）等有着漂亮庭院和配有勤务兵的住宅，从那里乘车到司令部上班。工作的时间大约是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左右。这些人表现出充满明快自信的神情和态度，穿着与南方气候相适宜的各种各样非常漂亮的军装，夹着上等皮包，进出于总司令部所在地高级中学的大门。我所在的这个编成班的工作，就是把各个方面军数月后作战的兵力、装备等編集、整理成复杂的文件。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工作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涉及，但一向不曾伴有战争的现实感。那是在整个作战中分离出来抽象化了的工作，在这里山川、河流或者城市，几乎连名字也不曾出现过。”^①

有着后方的或者上述这种司令部里经历的高级将

① 《归还兵的散步》，未来社版，1984年，第48—49页。

校们，他们谈论着充满粉饰毫无反省的“回忆”。如果把这种“回忆”当做典型的战争体验的话，不能不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二）前线军人、士兵特别是牺牲者的处境

那是1944年11月的上旬，载着前述小林升氏的运输船队“南下南中国海，在一个夜晚受到猛烈风暴的袭击，……数日后的又一个夜半，在平稳的海面，唯有自己所在的船遭到雷击而沉没……，经过一夜海上的漂泊，才得到海防舰的搭救，被送到越南（当时属于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的西贡。”后来，当小林氏读了大冈升平的《礼智（Leyte）战记》的第13章《里孟山——11月3～10日》时，才弄清楚，“正是自己所遭遇的风暴”，在此之前袭击了里孟山，“打这以后，那种在狂风巨浪颠簸着的船上，被暴雨和巨浪拍击而湿透全身的我，在台风中仿佛听到了里孟山士兵的呼喊，一种错觉支配了我。”^①

在记述里孟山日本军队士兵战斗的《礼智战记》中，有这样的一节：

“已经走到了绝路，也许可以活到70岁或者更长的生命、却只有25岁就完结了，一种扎穿胸膛的赴

① 《归还兵的散步》第44—46页。